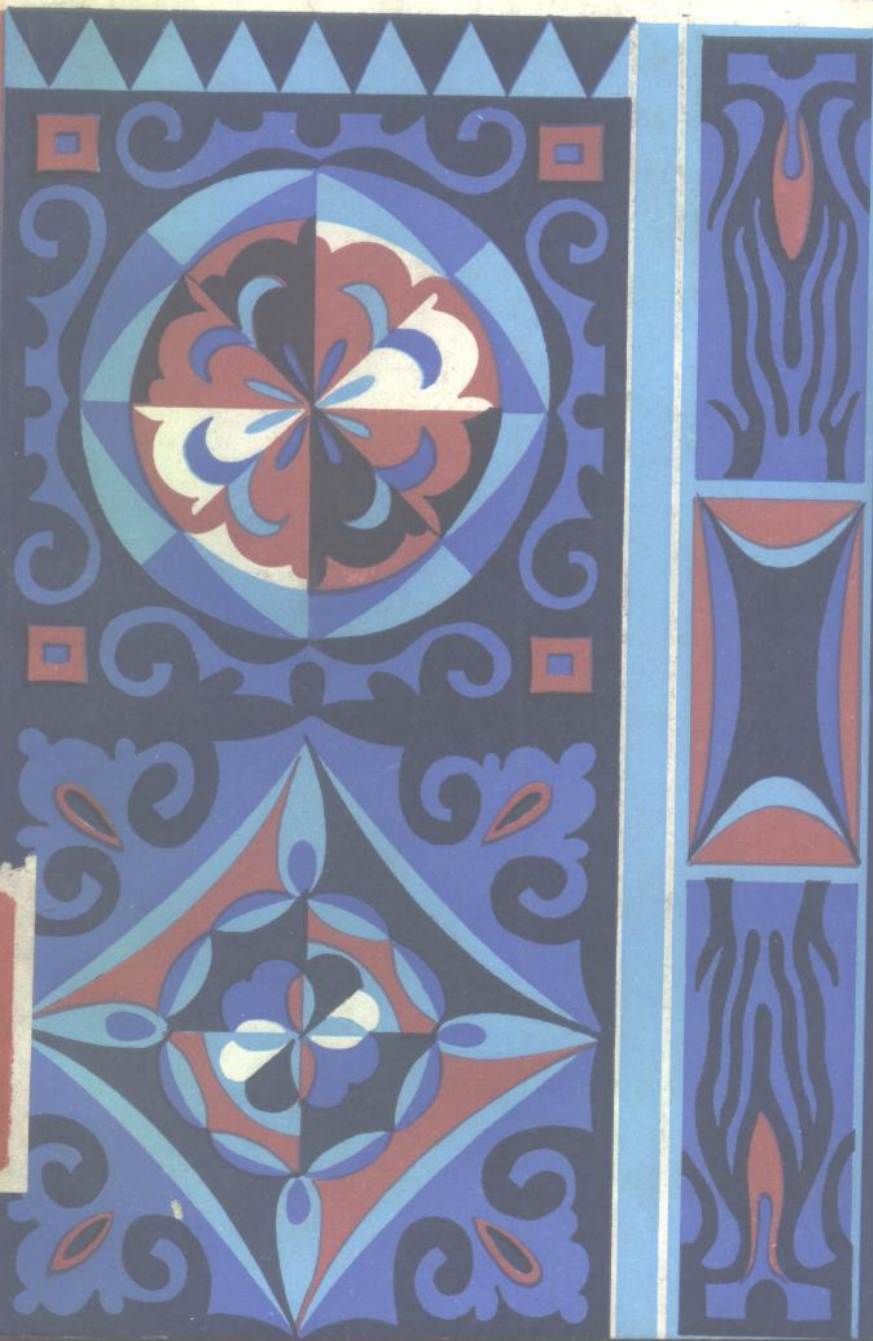


傈僳族民间故事选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DE 14/21
ZHONGGUOSHAOSHUMINZU
MINJIANWENXUECONGSHU • GUSHIDAXI

傈僳族民间故事选

祝发清 左玉堂 尚仲豪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3559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23559

责任编辑：张呈富
封面设计：何礼蔚
插图：陈雅丹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傈僳族民间故事选

祝发清 左玉堂 尚仲豪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10 字数 258,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10078·3567 定价：2.15元

编辑出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数量浩瀚,绚丽多彩,富有民族特色。它不仅具有文学价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从中可以吸取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营养,而且对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也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是我国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采集工作,有了广泛深入的开展,搜集到大量的民间故事作品和有关材料。为了使这宗世代口头相传的文化财富,通过妥善的整理和系统的选编,成为精粹的读物,以利于阅读、应用和保存;为了使我国多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得到发扬,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我们有计划地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故事大系》选收我国各少数民族散文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即一般通称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寓言等等。按民族分别选编,以各民族作品专集形式出版。全大系预定为五十六卷,每卷字数大致接近。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基本上各编为一卷。但根据各民族作品实际情况,有的民族作品特别丰富,编为正续篇两卷,有的两个或三个民族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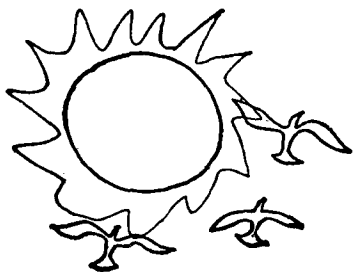
品合编为一卷。最后一卷为索引及其它资料。编选工作请民族文化部门、有关专业单位或专业工作者担任,并负责撰写前言。

《故事大系》各卷所辑的,主要为一个民族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顾及到内容、形式的多样性,以反映一个民族民间故事的概貌。所收作品经过整理,但尽可能保持原貌,以保存它的固有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故事大系》将根据各民族民间故事搜集工作进展的实际情况,陆续编选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六月



前 言

—

傈僳族是我们伟大祖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共有四十八万余人。其中近二十万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碧江、泸水、兰坪、福贡、贡山县。其余分布在丽江、迪庆、保山、德宏、楚雄、大理、临沧等地州以及四川省的西昌、盐边、德昌等县，同怒、独龙、汉、白、纳西、彝等民族交错杂居。因此，同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历来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傈僳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它的名称始见于唐人的著述中，樊绰所著《蛮书》称之为栗粟，并认为栗粟是“乌蛮”的组成部分。傈僳这一名称除在有关史籍中用字稍异外，自唐以来一直沿用至今。

傈僳族有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它有自己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近代还创造了文字，但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是以歌唱和讲述的形式口耳传承下来的。傈僳族人民所创作的民间诗歌和传说故事，一直作为他们自我教育的工具和斗争的武器；傈僳族的历史以及生产、生活经验，往往也用自己的口头文学来保存和传播。他们说：“盐不能不

吃,歌不能不唱。”无论喜庆节日,或是盖房、打猎,傈僳人都要唱歌跳舞。朋友久别相见,兄弟姊妹重逢,也要饮酒唱歌,叙述离别的思念,重逢的喜悦。青年男女社交、恋爱,更是离不开歌唱。傈僳族人民不但善于唱歌,而且也喜爱讲故事。在劳动休息的田边地头,在三五结伴同行的山间小路上,或是在一家人休养生息的火塘边,都可以听到他们那娓娓动听的故事讲述。傈僳族人也特别爱听故事,从中受到教育,增长知识,消除疲劳。长期以来,傈僳先民就是这样编织了许许多多优美生动的民间故事,作为自己生活的教科书。这些故事,就内容和体裁来说,有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有现实性较强的生活、爱情故事,有反映农民起义的革命斗争故事,有与动物关系密切的童话、寓言,有表现人民大智大勇的机智人物故事,也有描绘傈僳族地区山川景色的地方风物传说,等等。

二

傈僳族民间故事,就大多数而言,按其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颂扬美好品德。傈僳族是一个淳朴、善良、勤劳的民族。他们在长期的生活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美德和精神品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怒江地区傈僳族人民的优良传统,在全国传为美谈。傈僳人认为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是最可耻、最不道德的行为。在傈僳山寨,没有锁门的习惯,任何人都未必担心自己的东西会丢掉。在野外,也不会有人把拾到的东西据为己有。傈僳人民这种毫无私心杂念的传统美德,在他们的民间故事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两对朋友》就

满腔热情地讴歌了傈僳族人民讲道德、重友情的崇高品质。《贪财人的结果》、《蝥螬报恩》、《父行子效》、《孩子嘴里吐实话》、《偷来的酒不香》等作品，莫不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教育人们弃恶从善，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在热情歌颂人民高尚品德的同时，这类故事还无情地讽刺和鞭挞了狡诈、自私、贪婪、冷酷、嫉妒等丑恶品质。《石人的传说》便是一例，对善恶对比十分鲜明的兄弟俩，给予了真挚的赞颂和辛辣的嘲讽。其它如《姊妹俩》、《两兄弟分家产》、《孤儿尼格子》、《大姐和三姐》、《火烧腊门》等作品，也同样站在受欺凌受损害的一边，对邪恶势力和丑恶灵魂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这些故事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是非观念与道德标准。

二、歌颂民族英雄人物。自古以来，傈僳族人民总是把本民族的英雄人物作为自己力量的象征。在他们的民间故事中，常常以巧妙奇特的艺术构思，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塑造这些开天辟地的创世英雄和率领本民族人民迁徙、起义的领袖人物，歌颂他们的高尚品质和非凡本领。在《天、地、人的由来》中，就塑造了创造大地、创造人类的木布帕巨人形象，赞美了他为人类造福的英雄业绩；在《岩石月亮》、《喜鹊和布谷鸟》、《孤儿报仇》、《孤儿皇帝》等等故事里，也都热情地颂扬那些为人民除害造福甚至献出生命的英雄人物。傈僳族人民还通过丰富的想象，赋予光加桑以超人的智慧和力量，塑造了一个神通广大、本领高强的机智人物形象。这个艺术形象为傈僳族人民家喻户晓，是傈僳族文学宝库中“阿凡提”式的人物。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最公正的评判人。

傈僳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在人民的口头创作中几乎都有反映。如傈僳族乔氏族首领木必（又名木必扒），曾率领本氏族的木必家族，于十六世纪中叶进入怒江地区，完成了傈僳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这是最早进入怒江地区的一批傈僳族。《木必的故事》就是这一伟大行动的记录，是我们了解傈僳族古代社会的珍贵资料。它以神奇浪漫的色调塑造的具有非凡本领的木必英雄形象，至今仍在怒江地区的傈僳族群众中广泛地传颂着。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傈僳族曾掀起过无数次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一八〇一年——一八〇三年（清嘉庆六至八年）爆发的以傈僳族农民领袖恒乍绷为首的傈僳、怒、白、纳西、汉等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就是傈僳族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恒乍绷的故事》就集中地描写和歌颂了这次伟大斗争及其首领恒乍绷的英雄事迹。在这类故事中，傈僳族人民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表达了自己的爱憎，同时从这些故事中得到鼓舞，增强战胜各种困难和邪恶势力的决心和信念。因此，长期以来，这类歌颂英雄人物的故事，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经久不衰，成为傈僳族人民的口碑。

三、赞美忠贞的爱情。爱情生活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在傈僳族民间故事中，爱情也是经常表现的题材。它通过男女之间社交、恋爱、结婚的描写，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傈僳族社会的婚姻习俗，表现了傈僳族人民对待爱情的态度和观念。如《孤儿和龙女》，就是一篇流传很广的爱情故事。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对自由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讴歌了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解放前，傈僳族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苦难

重重。他们的爱情，常常遭到土司、山官、头人的践踏，以及不合理的“婚以牛聘”的包办买卖婚姻制度的阻拦。他们见不到太阳，得不到爱情的温暖，因此就特别珍视爱情，追求爱情，往往以诗一般的语言来赞美理想的爱情，对破坏或阻拦爱情的种种邪恶势力进行抨击，表现他们淳朴、健康的恋爱观和审美观。如《鱼姑娘》这个故事，就歌颂了一个孤儿与鱼姑娘的纯洁爱情，揭露和批判了作为邪恶势力代表的舅父破坏爱情的丑恶行径。《孤儿的故事》中的龙姑娘，则是另一个被傈僳族人民理想化了的与苦难的孤儿婚配的艺术形象。这个拟人化的美丽姑娘，或称龙女，或叫龙公主，在傈僳族爱情故事中常常反复出现，总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协助丈夫（或未婚夫）与象征恶势力代表的龙王斗争，是一个比鱼姑娘更为丰满的反动统治阶级叛逆者的形象，因而深受广大傈僳族人民所喜爱。

三

在傈僳族民间故事中，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孤儿故事特别多，也特别精采。这类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孤儿。许多英雄人物如木必、恒乍绷，还有机智人物光加桑，也都是孤儿出身。旧时代傈僳族多孤儿故事，有它的多种社会原因。长期以来，傈僳族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婚姻制，受汉族封建礼教的影响并不严重，青年男女在社交、恋爱、婚姻等方面，一般是比较自由的，已订婚或已婚的男女，解除婚约或离婚也比较容易。他们退婚或另成婚后，往往遗弃他们的子女或私生子，让亲属抚养。若亲属无力抚养，便成了社会上的孤儿。另一方面，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剥削和歧视，傈僳族人民被迫迁移到高山峻岭、雪山峡谷聚族而居，以刀耕火种的原始方式，从

事农业生产或狩猎活动,过着贫困的生活。孤儿故事,就是那种贫困生活的生动写照。善良的傈僳族人民,十分同情这些孤儿的不幸遭遇,但在当时生产、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条件下,又无力从根本上解救孤儿的困境。于是人们便抱着无限同情的心情,按照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借助美好的想象,赋予孤儿以倔强、机智、勇敢的性格和善良、诚实、正直的品德,塑造出一个个青少年孤儿的艺术形象,加以歌颂和赞美。这些孤儿故事一般在开头时笼罩着一层悲惨的阴云,结尾却云开雾散,充满欢快的色彩。诸如《孤儿奇遇》、《孤儿与小人国》、《孤儿得宝》等故事里的主人公,都遭受过种种磨难,但结果都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或借助大自然的帮助,或借助某种“宝物”的魔力,最后一改贫困处境,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由于这类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爱与憎、痛苦与欢乐,因而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充满强烈的生活气息,特别受到傈僳族人民的喜爱。

动物故事丰富多采,是傈僳族民间故事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傈僳族世代生活在森林茂密、野兽繁多的山区,男子以“善弩”著称,“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傈僳族人民熟悉各种动物,因此,勾勒动物的特征,描述动物的习性,寓意其中,便成为傈僳族民间故事中的常用手段。如《狗找朋友》、《白兔和老虎》、《麂子和穿山甲》、《麻鸡和野鸭》、《猴子扳包谷》等,几乎每一种动物都有趣味横生的故事,生动地揭示了善与恶、弱小与强暴、聪明与愚蠢、诚实与狡猾、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曲折地表现了傈僳族人民的感情和愿望。人们总是同情和讴歌前者,反对和挞伐后者。这是傈僳族人民的美学理想、乐观精神在文学艺术中的反映,也是他们

的民族性格的体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的动物故事中,兔子的故事不少,而且多半是把弱小的兔子描绘成智慧的化身,胜利的象征。在《老虎和兔子比赛摇尾巴》、《兔子和狐狸》等故事里,兔子总是聪明异常,不论在任何环境里,遇到任何狡猾、强大的对手,它总是能以智取胜。它是动物世界的“阿凡提”,或者说阿凡提在动物世界的化身。和其它动物故事一样,作者总是借动物讽喻人物,而在兔子故事中,这种倾向就更为强烈。它歌颂了诚实人、弱小者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战胜貌似强大、残暴、愚蠢的压迫者。这种褒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和反映了过去傈僳族社会生活的本质。

充分表现人民征服自然的英雄气概,是傈僳族民间故事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傈僳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过去发展很不平衡。接近内地的大理、保山一带的傈僳族地区,地主经济已发展起来,而在傈僳族聚居的怒江地区的泸水、碧江、福贡、贡山几个边沿县,交通闭塞,远离祖国内地,直至解放前夕,还保留原始的公有制和家长奴隶制的残余,生产力很低,加上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生活极其贫困。社会虽然有了初期的阶级分化,已经出现“搓波扒”(富裕人)和“搓吾”(头人、山主),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不明显,而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却很尖锐。作为观念形态的民间故事,就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所以,纵观傈僳族民间故事,反映人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作品为数较多。《盘古造人》、《孤儿报仇》、《小孩和老虎》、《茨帕妞姑娘》等,便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些故事,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傈僳族人民在战天斗地、征服自然、变革现

实生活的斗争中的英雄气概，表现了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和愿望。

四

傈僳族民间故事，是傈僳族人民理想和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思想内容丰富，其艺术风格也是千姿百态。它除了具有一般民间故事共同的艺术特征外，还具有傈僳族自己独有的艺术特色，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是故事性强。这是傈僳族民间故事艺术特点之一。不论是长篇或是短篇，都有一个结构完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故事的开展，既有头有尾，又跌宕多姿。如《阿普的故事》，写的是小伙子阿普与土司姑娘阿娜相爱的故事。一开头，先交代了阿普与阿娜私下相恋，便叙述阿普的母亲三次到土司家求婚，土司提出要三件不可能办到的聘礼，阿普只得出外寻找。接着叙述阿普历尽千辛万苦，经白发神仙指点，才获得了三件聘礼。读者正为阿普庆幸之时，故事出现了曲折，土司又提出新的苛刻条件：还要一对龙猪。这又勾起了读者的悬念，阿普却满口答应道：“可以，可以！我这就去赶来！”阿普将计就计，要来一把斧子就去砍土司家的门，说你家门太小了，龙猪进不来。吓得土司连忙改口说：“不要龙猪了，不要龙猪了！”最后土司不得不把姑娘嫁给阿普。故事情节峰峦起伏，高潮迭起，紧扣着听众和读者的心弦。这篇故事还成功地运用了民间故事艺术构思的传统手法，即“三段法”，如母亲三次到土司家求婚，土司要三件聘礼，阿普寻找白发神仙途中背负三件委托，白发神仙只解答三个问题，阿普获得答案后沿途为人民做了三件好事等，前后照应，使矛盾逐层展开，大大增

强了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作为人民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如果没有完整的故事性，就不能吸引听众，也就不易流传。在傈僳族人民中间广泛流传的《寻找太阳头发的故事》、《孤儿和龙女》、《连心鱼》、《吃蜜糖》、《青蛙伙子》等故事，都是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曲折复杂的情节，而在民间世代流传的。

二是富有奇异的幻想。幻想产生于对美好事物的热烈追求。在过去漫长的苦难岁月里，傈僳族人民的美好愿望和正当要求无法得到实现，不能不借助于幻想，依靠“宝物”、“法力”或“龙女”、“花姑”、“青衣老人”、“白发神仙”等的帮助来实现。于是在他们创作的民间故事中，便出现了象《宝葫芦》中要什么就会出什么的宝葫芦，要拖什么就会拖什么来的麻绳，要敲烂什么东西就能敲烂什么东西的铁锤，叫砍什么就能砍什么的长刀；出现了《火烧腊门》中指引腊迪得宝的山鹰，“要肉有肉，要酒有酒，要面有面”的石磨；出现了《救命葫》中那个能救人于危难、有起死回生之妙的救命葫芦；出现了会说话、会吐银子的大石头（《石人的故事》）；屈死的三姐会变成一只美丽的小鸟，几经周折，最后又恢复原形，与丈夫、儿子团圆（《大姐和三姐》）；一朵花会变作一个美丽的女子，与打山匠结成美满夫妻（《打山匠》）；一条小红鱼会摇身变成一个善良、贤惠的姑娘，和孤儿结配成双（《鱼姑娘》）；天上的月亮竟把茨帕妞和她躲藏的梨树连根拔走，成了月亮上的那棵树；太阳永远不会老，也不会死，是因为人世间的灵药被太阳拿去了一半（《神药的故事》）……这些奇特的幻想，丰富的想象，在傈僳族民间故事里是不胜枚举的。正是这些幻想和想象，才使故事显得那么神奇瑰丽，充满了浓厚的神话色彩，给人以美的享

受。

三是运用神奇的夸张。夸张是文学艺术所固有的一个特点。在傈僳族民间故事中，很善于运用艺术夸张的手法，描绘和塑造英雄人物。在《五兄弟》中，那个寡妇的儿子“不用弩，也不用刀”，“赤手抓住虎尾，把老虎活活拖回家”，“双手抓住龙角，把龙活活拖回家”；那个独脚牧人，“一跳能从平坝跳到山顶，从山顶跳到箐边”；那个以拾鸟蛋、掏蜂蜜为食的人，“倒爬树如履平地”；那个戴洋毡帽的人，左右拉动帽子就刮风下雨；还有那个鼻孔阔似喇叭的人，鼻孔一吹气就“飞沙走石，万物摇晃”。在《大力士王鄂》中，王鄂“每顿饭要吃十二只筷子那么高的一堆粟米粑粑”；他干活，“十个小伙子都抵不过”，他“背的背子，十个小伙子都背不动”；“三四个小伙子才翻得起来”的石板，他一个人就轻轻地“抬起来夹在腋下，带到放羊的地方揉羊皮”；“他用手指头弹了一下，凶恶的老虎霎时就断了气，口吐鲜血”。在《额头人》里，主人公一生下地就有“三岁娃娃那么高”，“和大人一样吃饭”，“第一天他吃一锅饭，第二天就吃三锅饭，后来就一天要吃一担饭”。他敢于同巨鹰斗，同妖婆斗。所有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巨人、大力士群像，都是傈僳族人民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法塑造出来的。

还有一些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造出来的英雄故事，傈僳族人民也把他们神奇化了。如具有超人本领的英雄木必，高举义旗的农民造反领袖恒乍绷，更是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将他们描写得有声有色，幽默风趣，突出了他们的思想性格。

四是运用拟人化手法。以物拟人，是傈僳族民间故事中常用的艺术手法。傈僳族人民赋予大自然中的日、月、草、木、鸟、虫、鱼、兽以人格，于是便以它们为主人公生发了一个个优

美动人的故事。如在《孤儿报仇》里出现的角色,有的是妖怪,有的是飞禽,有的是植物。故事作者抓住人和物的某一方面的特性,自然而巧妙地让他们组合起来,结成伙伴,一同去降妖除魔,施展其所长。故事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团结的力量,又恰到好处地突出了人和物的各自特长,这种特长又与人和物的自然特性紧紧相扣,显得那么奇妙,那么贴切,使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傈僳族人民还常常根据描写对象的生活习性的特点,来安排人物之间的关系,构成合情合理、引人入胜的故事。如老虎和兔子比赛摇尾巴,老虎和青蛙比赛过怒江,猫狗结冤仇,狗找朋友,猴子扳包谷,麻鸡和野鸭换羽衣,老熊与蚂蚱打架……这种赋予一切以人的感情、举止、思想的拟人化的描写,充满了丰富美丽的想象,闪烁着劳动人民智慧的光辉。它不但使人们得到独特的艺术享受,而且给人们有益的生活启迪。

从傈僳族民间故事中还可以看出,拟人化的对象相当广泛,除了有生命的动植物外,没有生命的非生物也被人格化了,如扫帚、剥下的笋叶等。傈僳族人民就是这样独具匠心地把人和动植物、生物和非生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编织成一个个美妙动人的故事。

从上面的简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蕴藏量极其丰富的傈僳族民间故事,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有它自己固有的特色。同时,我们从傈僳族民间故事中也可以看到,我国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在口头文学创作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痕迹。如蛇郎、小红鱼、龙女、小白兔、百鸟衣、兄弟俩、老妖婆等等,各民族都有这类故事,只不过在人物和故

事情节方面大同小异而已。特别是与傈僳族为邻的怒、独龙、白、纳西、彝、藏、汉等民族，这类故事更是相同或相似。还有，在傈僳族历史上从未建立过国家或封建王朝，也没有出过皇帝，但在《孤儿皇帝》、《木必的故事》、《宝葫芦》、《愚蠢的狮子》、《孤儿和龙女》、《光加桑的故事》等作品里，却出现了皇帝的形象。这类饶有兴趣的共通的文学现象，说明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文化交流的广泛和相互影响的深远程度。

这里还应当指出，一些同时在各民族中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它们作为某个民族的故事，又都打上了自己民族的烙印。因为第一，它是按照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审美观点和心理素质来描写、塑造故事主人公的；其次，故事情节的安排和叙述方法，都是按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条件以及地理环境等加以再创造，从而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革命导师马克思对表达人民思想感情的民间文学作品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八七页）。在漫长的生活和斗争中，富于智慧的傈僳族人民，创作了许许多多的反映自己的劳动和斗争生活，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深深植根于傈僳族人民的生活土壤之中，同傈僳族人民一起繁衍生息，世代相传，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它既是生动优美的文学读物，也是了解和研究傈僳族在过去时代的社会形态、生活斗争、历史概况以及民俗风习的珍贵资料。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十月于昆明